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何兹全　主编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

上　册

晁福林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1年·北京

目　录

绪论　春秋战国:辉煌的时代 …… 1
第一章　社会政治历史的演进…… 9
　第一节　西周后期的政治历史与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 9
　第二节　周平王东迁与春秋时期的周王朝 …… 41
　第三节　大国争霸与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的发展 …… 76
　第四节　战国局面的形成与周王朝影响的延续…… 168
　第五节　群雄逐鹿——战国中期的社会政治与军事…… 202
　第六节　战国后期的列国形势与秦的统一战争…… 274
　第七节　诸少数族的发展变化…… 328
第二章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进步…… 380
　第一节　农牧业的进步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380
　第二节　官营与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418
　第三节　冶金业的进步…… 439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进步…… 470

总　　序

何兹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

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

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的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撰这套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绪论　春秋战国:辉煌的时代

春秋战国是一个创造出繁荣经济与文化的辉煌时代,也是一个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术大师辈出的时代。若将春秋战国与同时代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就能更显示出这个时代的辉煌成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埃及和两河流域,在这个历史时期被波斯帝国征服,自此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兴起,在政治上出现了各个邦国由兼并趋于统一的进程。与此同时,希腊的古代文明也走向兴盛,雅典和斯巴达成为希腊诸邦的两个同盟的盟主。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角度看,当时影响巨大的三大文明中心,首先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然后是印度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这三个文明中间,只有中国是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而其他两个则是后来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再一次的证明。

各族的融合和相互促进,是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辉煌时代的标志之一。宋代洪迈曾描述这个时期诸族杂居的情况,谓:

>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

> 王城，而有扬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①

这里谓华夏族所居之地仅为当时“中国”的五分之一，未必合适，因为就是在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诸国之内也有戎狄居住，而当时的戎狄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有华夏族。就实际情况而言，如果用犬牙交错、相互融会来形容当时的少数族与华夏族居住的情况，应当是大致不错的。就总的趋势看，各少数族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在不断地吸收华夏族的先进文化，从而创造出具有本族特色的文化。在这个方面，作为白狄别种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堪称为典型②。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在河北平山发现了中山国都邑灵寿，在中山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银器、铜器和玉饰，铜器上契刻有长篇铭文，《中山王方壶》有 448 字，《中山王鼎》有 469 字，另有一件壶有 182 字。这些铭文中曾经反复引用《诗经》里面的句子，并且有和《左传》、《大戴礼记》相同的文句，表明中山

---

① 《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条”。

② 中山国是春秋时期鲜虞族所建立国家的延续，《史记·赵世家》之《索隐》谓“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关于中山国的族姓，古人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赵世家》载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集解》引徐广说谓“西周桓公之子”，《汉书·古今人表》亦谓“中山武公，周桓公子”。依此说，则中山国与周同姓。对于此说，前人早已指出中山势力强大，甚至可以与赵、魏等国抗衡，十分衰弱的周不可能以其子弟据中山为君。因为中山国曾经被魏文侯伐灭，所以有人认为此后的中山国是魏国的别封。对于这两种说法，专家曾经依据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所出土的中山国诸器铭进行辨析，肯定“战国中期的中山是春秋鲜虞（中山）的延续”（李学勤、李零：《中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国曾受到中原地区儒家文化的浓厚影响。中山国的器物多有精湛的错金银工艺,造型独特繁复的错金银龙凤方案、错金银犀形器座、错金银虎噬鹿形器座、错银有翼神兽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位于今四川、云南一带的巴蜀文化和滇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属于滇文化的器物,如精致的玉石和玛瑙饰物、青铜器等都有很高的制作工艺,编号为 M24 号墓所出土的祭祀扣饰,就是用当时相当先进的失蜡法铸成的,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并不逊色。少数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可以说是春秋战国这个辉煌时代的艳丽花朵。

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承继了商周以来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就拿青铜铸造而言,商周时代已经达到了鼎盛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发现一件时代属于战国晚期的嵌金铜犀尊[①],重 13.3 公斤,高 34.4 厘米,长 57.8 厘米,口长径 11 厘米,口短径 10 厘米。犀有一前一后双角,鼻角长而额角短,两耳短小耸立,双目嵌以黑色料珠,尾尖稍翘,短腿三瓣蹄,遍体嵌金作流云纹。犀背有椭圆形的尊口,上覆素面铜盖,有活环可以启闭。这件犀牛尊的造型厚重有力,犀牛肥壮而雄伟,昂首伫立,双目前视,神气活现,栩栩如生。这件作品继承了商周以来的青铜造型艺术,以雄伟为主要格调,但在纹饰上,又一改商周时代习见的饕餮纹为主的习惯,而代之以生动流畅的流云纹,使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兴平县出土的古代嵌金铜犀尊》,《文物》1965 年第 7 期。

犀牛在雄浑中又具有了活泼的气韵。这件作品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也可以说是商周以来青铜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以这个时期云南的青铜文化对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为例,略做说明。据专家研究,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可以分为五个类型,都是公元前 10 世纪直到公元前后的青铜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更具特色。例如滇池区域发现的青铜器,种类多至九十余种,并且许多青铜器上雕铸或镌刻着神态各异、服饰有别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铸造多采用陶范铸造,其上的圆雕和人物、动物形象则采用失蜡法。一些器物还采用了镶嵌、线划、鎏金等工艺。与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同时期的文化有越南东山文化和泰国班清文化等,其中以滇文化发展水平最高,东山文化和班清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滇文化的影响,"例如靴形钺和叶平面呈不对称菱形的圆矛、石寨型铜鼓,都是云南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共有的基本典型器。青铜器的主要几何纹—圆圈纹也是两者所共有","云南青铜文化中澜沧江中、下游青铜文化与班清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点,例如椭圆銎束腰铜斧就是两者所共有的基本典型器,靴形钺(不对称形钺)虽然两者之间形式上有一点差异,但大体上也相一致,说明两者的关系比较密切"[①]。专家的这个论证表明,虽然滇文化也在接受周围国家和地

①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 年第 6 期。

区的影响,但起主导地位的、产生影响主流的还是滇文化。辉煌灿烂的春秋战国文化呈辐射状向外扩展其影响,与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毫不逊色,是当时世界上各个地区文化发展中之佼佼者,我们足可引以为荣。

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以外,当时的稻作文化的广泛影响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据日本专家研究,春秋时代吴国人称稻为"粘",而日本语中稻为"伊乃",韩国称为"那拉克",越南称为"乃普",都有"n"的音,这些词语应当同源。这就说明了"以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为中心,稻米向四方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暗示了传播的时间",专家推测,"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开始,中国人对日本列岛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的往来经常化。大陆上的支石墓、少量石器、货币、稻米及其耕作技术传入日本"[①]。这个传播的时间正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日本福冈县板付初期弥生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剑,在形状上与我国辉县琉璃阁出土的战国青铜剑很相似,正是战国青铜文化对于日本影响的例证。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积极态度,中外文化交流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专家曾经对于考古发现所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玻璃器物进行考察研究[②],经过化学分析或光谱分析,可以确定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期墓所出土的玻璃珠是钠钙玻璃,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

① 蔡风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考古》1987年第11期。

② 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文物》1985年12期。

格上镶嵌的玻璃是透明度较高的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格上镶嵌的蓝色玻璃是钾钙玻璃。这些制品与我国所生产的铅钡玻璃并不一致，而和西方的钠钙玻璃或钾玻璃相一致，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云南江川李家山 22 号墓曾经出土有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浅绿色透明六棱柱状玻璃珠，属于西亚地区的产品。据推测，在四川和印度之间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一条商路。西方的文化很可能沿这条商路传入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制造的琉璃器也有可能通过商路而传向西方。专家曾对湖南省出土的琉璃器进行系统研究[①]。长沙所发掘的 1300 多座东周墓，其中 10％出土有器形以璧、珠为主的琉璃器，衡阳 105 座东周墓，出土琉璃璧 8 件、瑗 1 件、珠 5 颗、璋 1 对。益阳 47 座东周墓出土有琉璃璧、琉璃珠、琉璃剑饰等物。其他如耒阳、郴县、浏阳等，也有东周时期的琉璃器出土。随葬琉璃器的墓葬的墓主的身份都不太高，有些还只是方能容身的小墓，这些琉璃器多仿制周代礼器，长沙所发现的琉璃印上有东周时期的玺印文字，其成分经光谱分析表明其铅钡含量很高，与西方所出的纳钙玻璃显然有别。这些都说明湖南所出为当地的或附近地区的产品。古代曾经属于“大秦”(即罗马帝国)的罗马尼亚博物馆里面所保存的一些琉璃器，如蜻蜓眼式的琉璃珠与湖南东周墓中所出土者十分相似，研究者关于“这种珠饰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关”的推测，是可信的。

关于春秋时期的政治发展变迁，清儒顾栋高曾有“三大变”之

① 周世荣：《湖南出土琉璃器的主要特点及其重要意义》，《考古》1988 年第 6 期。

说。其说谓:

>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时势凡三大变。隐、桓、庄、闵之世,伯事未兴,诸侯无统,会盟不信,征伐屡兴,戎、狄、荆楚交炽,赖齐桓出而后定,此世道之一变也。僖、文宣和、成之世,齐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复炽,赖晋文出而复定,襄、灵、成、景嗣其成业,与楚迭胜迭负,此世道之又一变也。襄、昭、定、哀之世,晋悼再伯,几轶桓、文,然实开大夫执政之渐,嗣后晋六卿、齐陈氏、鲁三家、宋华向、卫孙宁交政,中国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为战国矣。孔子谓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实一部《春秋》之发凡起例。①

顾氏高瞻远瞩,所论甚精辟。春秋时代的政治变迁尽收其笔下。从政治发展而言,春秋前期,即顾氏所言的隐、桓、庄、闵之世,可以称为"小霸"时期。春秋中期,即鲁的文、宣、成、襄时期,是为春秋霸权迭兴之世。春秋后期,即鲁的昭、定、哀之世,虽然有吴越争霸之事,但总的看来,霸权已成明日黄花,各国内部正酝酿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诸侯缠于内政,无暇外及于争霸。春秋时期此三大变局,构成了中国古史上空前的政治波涛。其洶涌澎湃之势正是社会革故鼎新的巨大动力。

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转折点。我国上古时代的优秀文化,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历经夏、商、西周各个历史阶段,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总结。许多文化传统都在这个时期被系统化、理论化,并且在秦汉以降的各个历史时代里面得以

---

① 《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

保存和承继，许多春秋战国时期所整理而完备优秀的文化遗产，直到现代还一直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而鼓舞和激励着人们前进。春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学术大师，例如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其学术和思想一直为世人所景仰，他们的著作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对于深刻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秦汉以降的历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源流，也有重要作用。

第一章　社会政治历史的演进

第一节　西周后期的政治历史与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

作为社会经济的代表，作为社会结构的标志，政治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发展历程。这个时期的政治历史实酝酿着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次变迁，可以说，其发展变化的结果奠定了中国古代此后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那个时期社会观念的变化比较剧烈，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反映[①]。为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动奠定基础的历史大事是西周后期的“共和行政”，我们阐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应当从“共和行政”开始。

一、“共和行政”及其对于春秋战国政治历史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以诸侯国的霸权迭兴和群雄逐鹿为社会特征。仔细分析起来，这个特征实肇端于西周后期的“共和行政”。“共和

① 社会政治犹如高耸的建筑，而社会观念则像是建筑旁的水中倒影，足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清楚政治建筑的面貌。本章将社会观念问题与政治历史合而述之，用意就在于此。

行政”不仅是周代王权变化的转折点，而且是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识。司马迁曾经十分深刻地论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他说：

>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①

司马迁是在讨论春秋时期的十二诸侯兴衰问题时，讲这番话的。他已经把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眼光投向周厉王的时期，认为“共和行政”，是春秋时期诸侯兴起的滥觞。西周后期，特别是在“共和行政”以后，社会思潮和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观念的变迁，乃是巨大运转的我国上古社会的强劲脉搏，它表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重大变革的关头，具有鲜明特色的诸侯霸权迭兴和群雄逐鹿，在西周王朝覆灭以后登上历史舞台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西周前期，经过了成、康、昭、穆时期的平稳发展，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贵族礼乐兴盛。在盛世的烟雾氤氲、钟鸣磬响之中，人们“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②，沉浸于祥和的氛围里面。然而，周厉王后期的国人暴动，却犹如山崩地坼一般，惊醒了人们的甜美之梦，随之而来的长达 14 年之久的“共和行政”，更是社会政治格局中前所未有的大变动。

---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 《诗经·七月》。

公元前842年，广大的国人和部分官员、贵族以及士兵举行暴动，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奔彘（今山西霍县）避难，太子静藏匿于召公家不敢露面。在周王朝大厦将倾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主王政沉浮而力挽狂澜者是共伯和。古本《纪年》谓“共伯和干王政”，是关于此事的最早的文献记载①。共伯和即卫国诸侯卫武公。卫武公为卫僖侯的庶子。由于卫僖侯的世子早逝，所以共伯和继卫僖侯而为卫君，即卫武公。在西周后期，卫武公因敬慎威仪、注重道德修养而闻名遐迩。周厉王时期，卫武公以侯伯身份入周王朝任职。《诗经·淇奥》序谓卫武公“入相于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注引孟康说谓“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从彝铭记载推测，共伯和入周可能是先担任“师”职，继而又任“司马”之职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引或说谓三公指司马、司徒、司空。孟康说共伯和入周位列三公，是有根据的。《元年师兑簋》载“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庙，即位。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册令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专家谓此“师和父”，即入周任师职的共伯和。他当时已经拥有指挥“左右走马、五邑走马”的大权。这个时期的《师晨鼎》、《师俞簋》、《谏簋》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中的一件簋铭，都有关于司马共的记载，司马共当即由师职而升为司马的共伯和。彝铭记载表明在周厉王三年到

① 关于“共和行政”，《史记·周本纪》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依此说，在国人暴动以后支撑周王朝大局的乃是召公和周公。后世如韦昭、杜预、司马光、崔述等，皆从此说。但郦道元、苏辙、罗泌、顾炎武、梁玉绳等，力主古本《纪年》之说。由于古本《纪年》之说可以从《左传》及其他文献中找出有力的旁证，而《史记》之说却证据单薄，所以近年的研究中论者多以古本《纪年》之说为是。

五年这段时间,共伯和已经担任司马之职,在册封典礼中屡任师职人员的傧右,实为这些师职人员的长官。共伯和的职位应当就是周王朝最高一级的司马。关于共伯和在周厉王奔彘邑以后执掌朝政的情况,《师嫠簋》铭文载:

> 惟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遽!乃祖考有爵(格)于我家,女(汝)右(有)隹小子。余以女(汝)死(尸)我家。……东(董)裁内外。毋(毋)敢不善。

此伯和父即共伯和。从铭文里看,他当时已经以王的口吻在进行册命之事。铭称"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或谓此指厉王纪时,但于干支月相皆不合,但是却与共和元年完全契合。此年正月壬午朔,丁亥为六日,恰在初吉范围之内。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契合。所谓"惟王元年",即共和元年,亦即共伯和称王的元年。器主师嫠在这件彝铭的最后说"嫠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伯和父被称为"皇君",这颇为引人注目[①]。伯和父被称为"皇君",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古代文献中也不乏共伯和执政称王的记载。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春秋后期,和周敬王争夺王位的王子朝兵败之时,曾经檄告各国诸侯,历数周朝史事,其中谓"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这段话明确指出,周厉王奔彘邑以后,治王之事者是"诸侯",而不是召公、周公这样的王室重臣。前人曾经指出,召公、周公是周王朝的卿士,不得以诸

---

① "皇君"之称见于彝铭者,如"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易(锡)休命"(《叔夷钟》)、"奔走事皇辟君"(《召卣》),皆指君主而言,而不是普通的大臣或贵族的称谓。